

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

——竞争经济学

韩德强 / 著

直面现实社会问题，剖析市场经济内在逻辑，重建市场和政府，道德的良性互动

与亚当·斯密进行跨时代、跨文化对话，创建具有解释力和预见力的真实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

——竞争经济学

韩德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东岗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董永亭

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

——竞争经济学

韩德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开 14.75印张 300000字

2002年10月第一版 200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58-3259-x/F·2613 定价：25.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这本书写得很好，用通俗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市场神化论。我看了该书稿半个多月，甚喜作者立意高远，切中时弊。希望早日看到这本书的正式出版。

岱老（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桃李满天下，被尊为岱老，1997年与我们永别）1994年就告诫人们，要搞市场经济，但不要神化市场经济。这既是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又是积中国百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之谈。

遗憾的是，学术界某些人随风倒，计划经济的时候神化计划经济，现在转而搞市场经济了，又神化市场经济，完全忘记了岱老的告诫。随风倒，自然能够红极一时。升官发财不说，还被不明真相的青年学子当作经济学大师来膜拜，被报刊杂志纷纷追捧，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史无前例的市场神化论，什么“不找市长找市场”，什么“小政府大市场（或大社会）”。其实，这后一句话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重要大将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最先提出的自由市场

经济准则，并非我们中国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创新的命题。市场神化论的来势之汹涌，连市场神化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都望尘莫及。

事实胜于雄辩。市场不仅没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正在成为诸多问题的根源。就业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众所周知，目前，单是城镇登记和未登记的失业下岗人员即近8%，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更大。但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提前退休人员实际上也是失业人员，他们的退休金相当于失业救济金。如果一个人从20岁开始工作，到60岁退休，有效工作时间为40年。如果提前退休10年，则相当于10年失业，即有工作能力时间的25%失业。如果每个人都提前10年退休，则全社会失业率当为25%。如果其中一半人提前退休，则全社会失业率为12.5%。我估计，国有企业职工提前退休的比例很可能超过该年龄段的50%。将这部分人考虑进去，则仅城镇失业率就将达20%左右。这就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的失业率了（25%）。这么多人失业，意味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被闲置，没有利用，也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一方面是有人无工作；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一方面是牛奶倒进河里，房子闲在城里；另一方面却是农村孩子衣食有忧，城市工人拥挤陋室。这是市场经济失灵的最明显证据。现在，国外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常常惩罚无辜的局外

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

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是整体性的。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看法。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科学良知的学者深入其中，发现问题，大声疾呼，甚至著书立说进行反思的，又何止一个两个。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国内对西方经济学公开持整体批评态度的，可能很多人知道，是高鸿业教授。青年经济学家崔之元写了一本书，叫《“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也是否定市场神化的。

韩德强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批评西方经济学，这个角度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内部的反对派。事实上，他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源自亚当·斯密。韩德强自称，他是从矛盾论的角度批评西方经济学的。在他看来，西方经济学只是静态经济学，不研究经济现象的动态性及其本质，不研究经济现象间的整体关联性或复杂性，因而缺乏对经济历史的解释能力。他进而得出结论，西方经济学并不懂得竞争的目的、手段及全部经济后果，而只是美化竞争，神化竞争。他所做的，则是要让经济现象活起来，复杂起来，现实起来，并探究其本质特征，创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竞争经济学。他对基本经济概念如工资、利润、地租、价格、竞争、垄断等，都做了独

特的解释。我看，这些解释很有启发性，也更加符合实际。韩德强对西方经济学及其内部各派的争论比较熟悉，他经常借助西方经济学内部反对派的观点来批评主流派，但随后，他又会指出这些反对派观点的缺陷。这样，他就巧妙地论证了自身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学界刮起“惟洋是崇、惟洋是从”的风气下，在整个世界几乎都接受西方经济学洗礼的背景下，韩德强的这部新著称得上是创新性的独树一帜。这位年轻人让我想起了郭沫若先生的一句诗：“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其实，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工作者，韩德强的研究成果让我既高兴，又有些不安。毕竟，他所挑战的正是我所从事的。他是否真的会威胁西方经济学的生存，我还不能肯定。但是，他至少有这种潜力。也许，西方经济学真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神学体系。果真如此，则可以判定，只要市场经济不发生重大危机，市场神学体系很难被动摇。偶尔有人提出异议，也会进入宗教裁判所，被当作异端处死。相反，在市场经济发生重大危机的前提下，异见者或者可能另立宗派，成为路德式的宗教革新者；或者甚至成为达尔文，从根本上埋葬宗教。

从这个角度看，韩德强是幸运的。我看他赶上了机遇。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政府的支出都不断增长，使新技术带来的财富为中下层分享。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总的来说，运转良好。但是，市场神化论将这一切归功于市

场，要求放弃政府管制，或说什么“管得最少，是最好的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夫人断然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声浪响彻云天，市场君临天下。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华盛顿共识，要各国政府放松管制，削减福利，调整经济结构，放弃本国工业发展计划。结果，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落入“发展的陷阱”，债台高筑，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失业骤增，社会动荡，政府走马灯似的更换。害人者必害己。到90年代，日本、欧洲经济停滞、萧条。到2000年，市场化的洪水终于淹没最后一块经济高地。纳斯达克股市崩溃，道—琼斯股指大幅下滑，安然、世界通信、施乐、AT&T，以及安达信等大公司轰然坍塌。美国的跨国公司们正惴惴不安，在担心着成为下一个落水者。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大的衰退期。市场经济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斯蒂格利茨式的“宗教改革”就显得不够了，韩德强式的“抛弃宗教”的论点有可能成为新潮。

当然，韩德强自己也承认，他的竞争经济学还在初创阶段。他自己希望借破而立，我看还是破多立少，破强立弱，离形成概念完备、逻辑严谨的竞争经济学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胡代光

2002年8月16日

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面对现实，抛弃教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韩德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他坚持要我给他的新书写一篇序言，而我则感到他谈的命题太大，以至于我常常无法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判断，因而很不情愿写这样一篇序言。但是在韩德强的坚持之下，我还是下决心涉及一下自己不太有把握的领域，在这里来谈谈他这本书的特点。

这本书的首要特点就是它写得生动，充满了事实和现实的直观。作者能手到拈来地把事实材料结合进对自己的观点的论述中，教人读起来感到流畅，既感受到作者思想中含的激情，又不能不承认，作者所说都有我们每日看到的现实作为依据。

不过，这本书虽然完全从现实出发，论述的目的却极具理论性：作者力图否定主流的经济理论视为基石的两大论点——“看不见的手”信条和“竞争的优越性”。

所谓“看不见的手”信条，是200年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赖以生存的那个最基本的信仰：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人们的利己行为有效地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按照经济学家们的传统说法，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信条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导致韩德强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一书中把“斯密经济学”当成是“看不见的手”信条的代名词而痛加批判。韩德强列举种种事实，说明在现实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利己主义行为常常不仅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且使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更坏。不仅如此，他更直接推论说，“看不见的手”信条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这种批判大概会使每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以面对现实的精神读一读韩德强的论述，我们就应当承认，我们不应忽视他说的种种问题。

“竞争的优越性”也是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要教条之一，甚至是一个最主要的教条。自亚当·斯密以来，这个教条就统治着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当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以数学式的严格推理，证明了完全竞争如何能保证达到“帕累托效率”。但是在韩德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话。在本书中，它抓住了竞争神话的种种弱点，并对竞争神话的这种种弱点进行了最致命的攻击。

在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看来，竞争会使整个经济趋向均衡，而每个人都会在这种均衡下达到其个体的最优；在长期中，这种均衡还会使要素的报酬均等化，从而使人们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仅仅反映他们在初始要素禀赋上的差别。但是在韩德强笔下，竞争是商业上的冲突和战争，是个人之间争夺利益的残酷斗争。韩德强要我们面向现实的经济生活。他向我们揭示了现实市场竞争中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破产和失业，揭示了竞争过程在不断制造自己的反面——垄断，揭示了当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实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一幅令人难受的图景，我们在主

流经济学的竞争模型中是看不到的。但是，正视现实的人都应当承认，韩德强所说的，正是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竞争。

差别为何如此之大？韩德强自己的一个说法或许指出了问题的根本。他强调，亚当·斯密的竞争概念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竞争，而他的观点则来源于“从当事人（生产者）角度观察、感受竞争”——韩德强自己的专业就是经济管理。经济学说史上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是，亚当·斯密开创了由大学教授们研究经济学的时代，而他之前的经济学名著多半都是由自己从事实际营业的商人们写出的。这样一种发展本来并不坏，因为商人们总愿意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经济学的著述，大学教授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学的理论思维摆脱了商人利益的束缚。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研究目标：经济学要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它并不教人如何致富，也不应当只为某一个利益集团辩护。

但是，大学教授们垄断经济学研究也带来了一个很坏的后果：经济学的理论严重脱离了实际，许多经济学家根本就不知道企业是如何经营的。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企业主们就明确地告诉他们的儿子：他们根本就不是根据什么“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之类的经济学原理来确定自己的产量和价格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认定，垄断企业在确定自己的产量和价格时，要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方的大企业通常按照简单的“成本加成”方法来确定自己的产品价格。由于主流的经济理论家们对西方企业的实际运营知道太少，他们甚至无法确定，企业在为自己产品定价时所使用的哪个“加成”比率是顺周期变动还是反周期变动。

我还深深地记得近20年前的一幕：一个要开办商店的人问我这个当时的经济学研究生应当如何做生意，我仔细想了一下学过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竟感到无言以对：难道我去教给他那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在有許多竞争者时，要跟着市场上的价格走？”我只好给他讲，如果你能够造成一个垄断地位，那就有钱赚了。

可是一个普通的小商店如何能造成垄断地位，我却一点也说不出。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会陷入这种尴尬。许多讲主流经济学头头是道的人，都可能碰上这种尴尬的局面。难怪西方有人嘲笑主流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与商人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家的脚并不放在地上，而商人则把4只脚都放在地上”。

读者当然会问我：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待韩德强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如何看待“看不见的手”信条和“竞争的优越性”？

韩德强对“竞争的优越性”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依据的是现实当中的事实。但是对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倒在于简捷地说明，现实当中的竞争与理论上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同。理论上的竞争是如此美妙，而现实当中的竞争却产生了那么多不妙的后果，对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一直在力图加以解释。按照他们已经做出的分析，现实当中的竞争之所以不像理论上的完全竞争那么美妙，是因为某些行业中的企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或者是因为外部性的存在，也可能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即便是做出了这样一些理论前提上的“放松”，我们也无法完全说明现实当中的竞争为何如此令人不愉快。我想，完全的说明至少还应当承认下列现实的因素：未来的不确定；人们的理性和计算能力十分有限，而且分布很不均匀；个人之间有“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别，这里的经济实力不仅是指劳动能力和资本的拥有量；人们有不同的道德观，它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人们在现实的竞争当中不仅仅使用自愿交易的方式相互打交道，他们可能使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手段来相互竞争（或斗争）。

至于“看不见的手”信条，就更经不住理论上的推敲。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利己的人确实客观上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但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完全是靠了这个模型所包含的其他假定前提：完全的信息，人人都完全遵守自愿交换的道德准则，等等。但是在这样一些附加的假定前提下，利他主义的行为也同样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附加的假定前提得不

到遵守，利己的行为就很可能不仅不会增进社会的福利，反而造成社会的灾难。请想一想，如果人人都不遵守自愿交换的道德准则而去为利己的目的偷、抢、骗，这样的利己主义岂不会给社会造成极大伤害。而如果人人都能像完全竞争模型要求的那样完全遵守自愿交换的道德准则，这样的社会本身已经对利己主义施加了很强的限制。至少可以说，按这种道德准则施行的利己主义，已经不是最极端的利己主义。

这里我需要澄清一下经济思想史上的文献。按照一般人的流行说法，“看不见的手”信条宣传那只“看不见的手”，使人们的利己行为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这个信条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而在实际上，这个信条是曲解了亚当·斯密的思想 and 学说。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但是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并未提到“看不见的手”。人们最爱援引的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出现在讨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四篇第二章中。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二章中，亚当·斯密也表述过近似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但是说法有相当大的不同。亚当·斯密在那里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①

这是亚当·斯密对利己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基本看法。在这里，亚当·斯密强调“交换对人类的好处主要是通过利用人的利己心”。但是，这个命题不过就是说，“我们必须利用人们的利己心以有

^①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上册，第13~14页。

利于社会”，其背后的思想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换的时候）利己心会有利于社会”。绝不能把这样一个命题等同于“利己行为全都利于社会”，因为可以与这个命题不相冲突地提出另一个命题：“利己心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抢劫时）对社会不利”。

在亚当·斯密心目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更大的局限性。他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看不见的手”时，讨论的是“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这里，他论证自己的自由贸易主张，反对“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亚当·斯密的理由相当简单：“社会的全部产业”必定局限于“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内；资本所有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会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是让政治家来指导私人应当如何运用其资本，而政治家显然不如资本所有者明白他自己的资本在哪里会带来“最大价值”。

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到“看不见的手”时所讨论的问题。他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资本所有者为追求私利所决定的资本用途必定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是他对这个论点的论证表明，他为“看不见的手”生效规定了附加的条件。他为此在这一章中论述说：

“第一，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因而都尽可能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如果这样做他能取得资本的普通利润，或比普通利润少得有限的利润”；

“第二，每个个人把资本用以支持国内产业，必然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物尽可能有最大的价值”。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算

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①

我们在上边不仅详尽地引证了亚当·斯密提到“看不见的手”时所做的全部论述，而且说明了亚当·斯密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上下文中提出这个著名论断的。仔细阅读亚当·斯密的全部论述就可以看到，亚当·斯密并没有做出有关“看不见的手”的一般性论断：他既没有说“任何利己行为都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甚至也没有说“竞争的市场中的利己行为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他说的“看不见的手”，其作用的有效范围极其有限：只是对那些资本所有者来说，而且只是在他们决定向哪个产业投资时，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引导着利己的行为增进社会利益！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密在提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有益作用时，明确地把它限制在“这场合”之下、至多是在“许多场合”下，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

还要注意：亚当·斯密之所以相信“看不见的手”会使投资人的利己行为增进社会利益，是因为他认定“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因而都尽可能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这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英国或许是事实，但是在200多年后的“全球化”的今天，这绝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不正是那些自称为亚当·斯密信徒们今日在最卖力地鼓吹“资本在全球

^①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下册，第24—27页。

自由流动”吗？在这些人心目中，坚持将资本投在本国的亚当·斯密应当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老朽。反过来讲，由于亚当·斯密把“看不见的手”的有益作用设定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对今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他可能也不敢再说“看不见的手使利己行为对社会有益”了吧！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PE)是由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编辑出版的。可就是在近几年，这本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论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学说。文章的主要论点与本文前边所说完全一致。它强调：亚当·斯密绝没有赋予“看不见的手”以普遍适用的意义，而是将它的适用性限制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亚当·斯密讲“看不见的手”，是强调自由贸易会使人们将资本留在自己的祖国，从而有利于本国的资本积累和国防事业，而这后两点又是亚当·斯密极其看重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把“看不见的手”信条与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严格区分开来。亚当·斯密至多说过，在“许多场合”下，“看不见的手”会使利己行为对社会有利；但是他绝不会说，任何利己行为都对社会有利。在亚当·斯密心目中，“看不见的手”绝没有像“看不见的手”信条所说的那种普遍适用的作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亚当·斯密本来是个道德哲学教授，他专门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来探讨人类的美德如何产生。在经济学说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许多人认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把人性说成是利他的，而《国富论》则把人性说成是利己的，为什么这两本书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而根据我们前边所说的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论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那个普遍适用的“看不见的手”信条，其实是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论述的任意发挥和曲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把这看成是对亚当·斯密的颂扬，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让亚当·斯密蒙受了不白之冤。

附带说一下：从上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亚当·斯密本人有

关“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中，除了主张自由贸易这一点之外，许多思想与其说像今日的经济自由主义，倒不如说像我们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亚当·斯密否认资本的跨国流动，强调将资本留在本国以进行积累，关心国防，这不都是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吗？至于亚当·斯密本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使资本家的利己行为造福于社会，而我们这种国家的利己主义者正在忙于从非资本家变为资本家，忙于将他人的资本变为自己的资本。亚当·斯密即使能死而复生，大概也没有胆量把这种利己行为说成是有益于社会的吧。

尽管我与韩德强对亚当·斯密的看法不同，我仍然高度评价本书的意义。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其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是极为前沿的。就在几年之前，萨缪尔森、西蒙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师还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利他主义的经济学”。他们所得的结论对利己主义经济观极为不利。这只是突出的事例之一，它反映的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的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经济学和经济生活中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问题。而韩德强的这本书，以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尖锐地再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这个讨论。

本书的意义首先绝不在于它说出了多少正确的东西，而在于它让我们不能不思考经济学和社会之间关系上的一个最根本问题：经济学对社会的道德观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由此又对社会的演化起了什么作用？

韩德强在本书序言中强调：“利己主义价值观并不像其声称的那样，是因为人性自私，而是因为社会塑造。”这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们应当承认，“看不见的手”信条确实塑造了利己主义价值观上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这个信条，加上哈耶克的“好人会干最坏的事”的理论，真是在发生着海淫海盗的功效。在这样一些观点统治下，人类社会文明增进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人